

# 理想别

人民公社

张乐天★著

制度研究

黄若道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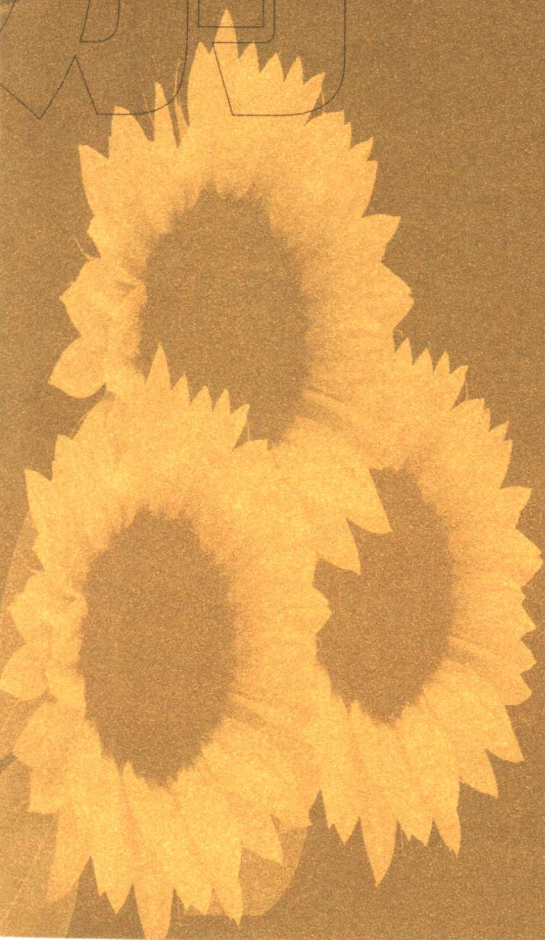
张乐天★著

人民公社

制度研究

黄若道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张乐天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08-05949-7

I. 告... II. 张... III.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  
IV. F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4458 号

题    字    费孝通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告 别 理 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张乐天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8.5 插页 8 字数 522,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949-7/D·1028

定价 40.00 元

## 内容提要

人民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在中国农村仍不时可见其忽隐忽现的踪影。那么，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呢？本书对此作出了解答。全书分“公社制度的嵌入”、“‘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人民公社的终结”四编14章，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不仅重新展现了人民公社的基本面目，而且提出了不少饶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及值得认真思考的社会问题。书末另附三个有关人民公社的重要文献，亦颇有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在陈家场自家的房子前，摄于1988年。

# 人民公社

制  
度  
研  
究



作者的父亲张绍达在作者房间前的照片，摄于1977年。

# 理想

# 告別



本书作者的继母顾彩林摄于20世纪30年代末，作者曾与继母一起生活20多年。



# 人民公社

制  
度  
研  
究



# 理想

作者与继母顾彩林、妻子沈锦萍在浙江海宁陈家场家门口的合影，摄于1981年。





本书作者与妻子在陈家场的新房内，摄于1985年。

# 告 别

作者家的旁边是一片无杆密植桑地，作者与妻子沈锦萍摄于1985年。





作者在农村调查时与几个邻居小孩的合影，摄于1989年。

20世纪80年代末，偶有汽车开到陈家场，这是一对母女在一辆轿车前的合影，摄于1989年。

理想





# 告 别

陈家场的陈康颐。在人民公社时期曾长期担任生产队长，摄于1989年。

陈家场。原联民大队大队长陈甫堂在家门口，摄于1989年。





陈家场一位世纪老人坐在家门口，摄于1989年。

# 序

陈锡文

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中国农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度过了整整26年。在这一时间中,中国农村的发展或停滞、中国农民的希望或苦难,都与公社制度直接相关。所以,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直到今天,在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组织体制和农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仍不难看到公社的影子。公社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一把钥匙。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都绕不过公社。

张乐天奉献给我们的这一部新著,就是一部专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著作。近些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这一主题,但专门的著作,尤其是以一个生产大队、生产队暨村落为对象的专门著作则迄今未见。张乐天的这部专著以浙江北部一个普通村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细致入微地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获得了有关一个中国普通村落农民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清晰图景。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大多都读过费孝通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由于《江村经济》的存世,使得后人永远有机会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江南水乡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而张乐天的这部著作,则给人们提供了了解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情况的珍贵素材。仅从这点看,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的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色彩。除了学术训练方面的原因外,这还与作者个人的经历有关。他就出生于联民村中一个普通的农家,在1958年的工业化浪潮中随家迁入上海,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了家乡,直到再一个十年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这样的特殊经历,使得作者成为既是一个幸运的农民,又是一个幸运的学者。作者充分利用了这一独特的生活背景,使得他在研究中能够搜集到许多常人难以搜集到的珍贵的乡村文献。如从1954年到1995年的联民村的完整的经济资料,从1954年到1982年联民村一大队干部完整的工作笔记等等。不仅如此,作为联民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有着自己对于当地民风民情的独特体验,他能够在与乡亲们的唠家常中获得许多对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的线索和信息。从这点来看,本书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其

特色的。

作者从公社制度的建立、“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公社制度的模式以及公社制度的瓦解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贯穿其中的是他创立的分析模式：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

在书中，作者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与村落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及至部分的融合构成了这一时期浙北农村生活的主要线索。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给浙北农村发展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正是这一制度却最终瓦解了千百年形成的村落传统。作者因此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浙北的村落将怎样超越“循环的陷阱”，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而对于人民公社遗产的清理和思考，是否将有益于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看来，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学者难以回避的问题。

告别昨天但不能忘记昨天，远离昨天时则能更客观地分析昨天。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人忠实地记录昨天。张乐天的这部著作至少努力地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正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就都有理由感谢他。

1996年6月于北京

# 自序

1988年1月,当《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带着油墨的芳香摆上书架的时候,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这本书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中曾被列入北京学术著作销售排行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1988年3月12日至14日曾为这本书召开了全国学术讨论会。中国最权威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当年就为这本书发表了长篇书评《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突破》……此后,书脱销了,但是,仍有许多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找我。有一次,我给西部的基层干部做讲座,他们知道了我的研究,不少人提议:张老师,多留点时间,说说公社!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出版以后的巨大反响出乎我的预料,令我感慨,更引起我的反思。当年,我孜孜不倦地搜集原始资料,孜孜不倦地描述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故事。或许,正是这种追求赋予本书以历史的价值。当本书滤去了意识形态的遮蔽,追回了逝去的时光,她就显现了公社的真实生活;而一个小村落真实生活所具有的历史与学术价值是怎么说也不会过分的,因为,“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这就是本书值得反复阅读的原因!说实在的,书出版以后,我还在反复“阅读”联民村,这里说一说我的一点阅读体会,以为该书新版的序。

## 一、道德、仪式、剧场社会

古老的中国有许多古老的故事,古老的谜。其中,20世纪40—5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变迁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50年代初期建构了乡村发展的逻辑起点,设定了乡村演化的路径,从而成为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关键时期。然而,当我们认真考察浙北农村50年代初期的情况时,我们会为一个问题所困扰。浙北农村是新解放区,解放以前,农民压根儿就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和平接管海宁县的“南下”干部才数百人,他们凭借什么在短短几年里就在农民中

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真正实现了政权的更替？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又是怎样的社会？

浙北解放了，共产党靠什么来争取农民，赢得民心？为了寻求答案，我们认真“阅读”。从解放军进入海宁以后的一个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共产党为浙北的农民所接受，最初靠的是道德，是与传统农民心中的“好人”相契合的道德，是可能给贫苦农民带来利益并“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高尚的道德。

海宁是和平解放的，但是，在农民眼里，解放军和南下干部都是“兵”。

海宁的农民见过各种“兵”，他们对“兵”的印象极坏。农民们起初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新来的解放军，在与解放军有了接触以后，他们的态度改变了。陈家场的一位妇女向我们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的情形。

那一天我在河边洗尿布，路上走来几个解放军。我一看有“兵”走过来，十分害怕，转身就想躲到家里去。一位长着一副娃娃脸的解放军和气地说：“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是为老百姓的。”这时，我那才二岁的儿在场地边跌了一跤，哭了起来。一位解放军马上跑过去，扶我儿子起来，帮他拍掉衣服上的灰尘，还不断哄他，让他高兴。见到这情形，我也不怕了。解放军真的是好人。

海宁的南下干部当时实行供给制，没有薪金，仅有每人每月四两（十六两制）老烟和一斤猪肉钱。他们身着土布军装，脚穿粗糙的布鞋。他们在县内开会都靠双脚走路。<sup>①</sup>如果当天不能来回，他们还要自己带铺盖。海宁一些当地人看不懂新政府干部的行为，他们私下里向南下干部们打听是怎么回事。下面一则对话是70年代一位南下干部的回亿：

有人悄悄地向干部打听：“同志，你们拿多少薪金一个月？”

“我们没有薪金。”

人们惊愕了：“那么，政委和县长呢？”

“也没有。我们上下平等，大家都一样。”

“那，——你们为什么甘愿吃这么大的苦？还要打仗、拼性命？”

“为革命呀！为穷人翻身解放，将来都过好日子。”

“你们真了不起！从来没有听说过，天下竟会有这种事！——还以为你们都把钱寄到山东去了呢。”<sup>②</sup>

<sup>①</sup> 当时海宁县交通还比较发达，有车有船，但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海宁县内不准报销交通费，也没有任何的住宿补贴。

<sup>②</sup> 参见中共海宁县委宣传部编：《海宁解放前后》，1979年内部印刷，第28页。



“好人”解放了海宁，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到来冲击了平静的乡村，在街头，在茶馆，在亲戚朋友的交谈中，农民们谈论着各种新鲜的事情。3个月以后，一次群众大会震撼了海宁的农民，使好人及其道德升华。下面的故事因为被陈家场一带的农民们反复地讲述而一直流传到了20世纪60—70年代。<sup>①</sup>

1949年8月某日，海宁许村区人民政府内，中共许村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王芝印、区长王绪生和组织委员李开进等人正在研究工作。区中队的马桂林班长正在一边擦枪，不慎走火。突然，“砰”的一声，子弹穿过楼板，打死了楼下的居民蔡洪根。

蔡洪根26岁，与其母亲一起住在区政府楼下厢房里。母子俩原与区政府关系很好，儿子突遭横祸，母亲悲痛欲绝。许村地区的居民和农民们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区委立即把情况报告上级，并得到上级指示：为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使新区人民了解和信任党，就地枪决马桂林，妥善安排他母亲的生活。

第三天，许村潮王庙开群众大会，上千人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大会开始，区长讲了走火经过，并宣布上级的决定：立即枪毙马桂林，终生赡养蔡洪根的母亲。会场窒息了，突然有人喊：他不是有意的，不能枪毙他。蔡洪根的母亲哭着跑到台前，当场认马桂林为干儿子，舍命也要保下他。马桂林终于免于死。<sup>②</sup>

群众大会是区委刻意安排的，从会场的布置到群众的参与，犹如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大会以悲剧的方式展开，不仅使其中内含的“好人”道德更具有震撼力——如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即使完全是无意的，也可能受到枪毙的惩罚，而且使“好人”道德净化为革命道德，使个人道德升华为国家道德并在农民中树立起国家的权威。群众大会以震撼人心的仪式征服了农民，农民从仪式展开的过程体察到了新时期的新道德——国家的道德形象是极其纯洁的，国家会毫不犹豫地惩罚一切破坏了道德形象的人，即使他们是无意的，即使他们曾经是国家同志。

这个故事很快在浙北的一些地区传开了，并且传了很久很久。这说明，群众大会实现了组织者的一个目标：宣传群众，扩大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农民中的影响。这说明，群众大会作为革命的仪式实现着仪式的功能：仪式结束了，但是，仪式所建构的革命表象却继续在发挥着作用，继续在影响着农民的行为。这说明，个人的或部分人

<sup>①</sup> 本文作者在1968年回到家乡时还听说过这个故事。

<sup>②</sup> 参见《海宁解放前后》第81~85页。